

捷克的國家認同

紀舜傑

淡江大學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副教授

摘要

本文的主要經由檢視捷克的歷史發展，探究其民族主義的重要元素與國家認同建構的歷程，並以認同理論提供的脈絡基礎，討論捷克國家認同的重要動力和議題。捷克的國家認同和集體記憶是在數百年外來統治中萌芽，在 19 世紀文化民族主義中壯大，強調語言、文化與領土的連結。在 20 世紀兩次建國與分離、以及共產統治和非暴力民主革命的過程中持續形塑。1918 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成立後，認同融入國家框架，試圖融合捷克與斯洛伐克民族，卻因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斯洛伐克獨立及 1968 年聯邦化而弱化。1993 年的分離標誌著捷克認同的轉折點，並促使認同從憲政基礎轉向更強的民族文化基礎。捷克認同的特性展現在堅固的國家認同、對歐洲整合的實用主義態度（歐洲懷疑論）、以及透過藝術、歷史教育和社會對話來傳承和重構歷史記憶，確保其民族精神與國家利益的核心地位。特別是視語言、宗教、祖先以及在該土地上的出生密切相關。捷克國家認同與政治認同互相編織，捷克民族主義中還存有捷克斯洛伐克主義的遺緒，表現出民族認同並非單一面向，而是多元且流動的認同。

關鍵詞：捷克中心主義、布拉格之春、絲絨革命、絲絨分離

壹、前言

捷克共和國（Czech Republic，簡稱捷克）位於中歐，是一個內陸國家。東邊與斯洛伐克為鄰，南接奧地利，西連德國，北邊連結波蘭。首都布拉格位於國土中心，是重要的地理和文化樞紐。捷克以其悠久的歷史、文化遺產和旅遊吸引力聞名。布拉格被譽為「百塔之城」，擁有布拉格城堡、查理大橋等世界文化遺產，吸引大量遊客。此外，捷克在中歐以經濟穩定、創新能力和高生活質量聞名，經常被視為文化與現代化的結合。「捷克金手」（Czech golden hands）是捷克共和國一句廣為人知的諺語和文化表徵，頌揚捷克人在手工技藝、創造力與工程技術上的卓越能力。這句諺語深深植根於捷克人的認同中，是對自力更生與機智的驕傲，類似於美國的「洋基創意」（Yankee ingenuity）或瑞士的「精準工藝」（Swiss precision）（Pohanka, 2022）。捷克擁有豐富的文學、音樂和藝術傳統，如作家卡夫卡（Franz Kafka），昆德拉（Milan Kundera），與作曲家德沃夏克（Antonin Dvorak）。卡夫卡是捷克最著名的作家，其作品《變形記》《審判》影響現代文學。另外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也是廣為流傳的作品，展現捷克在共產時期的心靈掙扎。

捷克與台灣的關係在歐洲國家中相對突出，主要建立在共享的民主價值、歷史經驗以及務實的經濟與文化交流基礎上（McVicar, 2023）。兩國皆經歷過從威權或共產體制轉向民主的艱辛歷程，例如捷克的絲絨革命（1989年）與台灣的解嚴（1987），這讓雙方在追求自由、法治與主權的理念上高度契合。捷克前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l, 1989-92, 1993-2003）自 2004 年起即公開支持台灣民主，並視其為價值盟友，這種遺產影響至今，成為捷克外交的道德指南。在經濟層面，台灣是捷克在中東歐國家中最重要的投資夥伴之一。例如鴻海集團（Foxconn）在捷克創造了約 5,000 個就業機會，獲捷克頒發「最佳十年雇主獎」第二名，而中國的投資承諾則多未兌現（姚惠茹，2022）。政治上，高層互動頻繁是關鍵指標。捷克眾議院議長自 2018 年起率團訪台，參議長維特齊（Milos Vystreil, 2020-）在 2020 年訪台時以中文高呼「我是台灣人」，以及 2023 年總統當選人帕維爾（Petr Pavel, 2023-）

致電台灣總統，均象徵關係升溫（楊思敏、梁駿樂，2024）。本文的主要經由檢視捷克的歷史發展，探究其民族主義的重要元素與國家認同建構的歷程，並以認同理論提供的脈絡基礎，討論捷克國家認同的重要動力和議題。

貳、歷史回顧

回顧整理捷克的歷史發展，在西元前，凱爾特人的一支波伊人居住於捷克地區，因此該地被稱為波西米亞。9世紀末，捷克人接受了羅馬天主教。1004年，波西米亞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的一個諸侯國，並在接下來的900年中受到德意志政治和文化的深刻影響。在11世紀，德意志人移居捷克，使德意志文化進到當地社會。進入14世紀，盧森堡王朝的查理四世（Charles IV, Holy Roman Emperor, 1355-78）在1348年創立了布拉格大學，使布拉格成為當時歐洲的文化中心，這是布拉格的第一個黃金時代。隨後，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兼任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與波西米亞國王，再次將布拉格作為帝國的首都，尤其在魯道夫二世（Rudolf II, Holy Roman Emperor, 1576-1612）時期，布拉格在政治與文化上達到高峰。

捷克在宗教改革運動中也扮演了先驅角色，但隨之而來的衝突使其陷入了長期的「黑暗時期」。在馬丁路德之前，捷克的揚胡斯（Jan Hus）提出了宗教改革思想，批判教會的腐敗和贖罪券，倡導以聖經為唯一依據，成為新教運動的先驅。在1411年，胡斯被天主教會開除教籍並處以火刑，他臨刑前所說的「真理必勝」（truth prevails），成為捷克人面對外來統治時的精神支柱，並在1920年成為國家格言（Wikipedia, 2025）。到了17世紀初，捷克新教貴族為反抗哈布斯堡王朝斐迪南二世的高壓天主教政策，於1618年發動了「布拉格拋窗事件」，將兩名帝國欽差丟出窗外，點燃了三十年戰爭的導火線。然而，1620年，波西米亞軍隊在白山之役中慘敗，捷克徹底淪為奧地利哈布斯堡的轄地。戰後，哈布斯堡王朝強制推行天主教，將德語定為官方語言，並沒收新教貴族的土地，大量知識菁英被迫流亡，捷克的政治和文化發展進入了長達數百年的「黑暗時期」。

直到18世紀末起，捷克民族意識在啟蒙運動的影響下再度覺醒，展開

了長達百年的民族復興運動。在語言與文化復興方面，這場運動起初致力於提升捷克語的地位與形塑捷克文化，以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日耳曼化政策。知識份子深入鄉村，整理捷克語言與民族傳說，創作自己的史詩與歌謠。國家博物館、國家歌劇院等象徵性建築在此時期以新文藝復興風格建成，許多地名也改回具有捷克歷史意義的名稱，例如將「石頭橋」(*Kamenný most*) 更名為「查理大橋」(*Karlův most*)。

20 世紀的捷克經歷了獨立、兩次世界大戰、共產極權統治以及最終的回歸民主，是其歷史上最為動盪的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馬薩里克 (T. G. Masaryk) 等人的努力下，捷克斯洛伐克於 1918 年 10 月 28 日宣布獨立，成為一個共和國。1948 年，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上台，開始了四十餘年的統治。1968 年，捷共領導人杜布切克 (Alexander Dubček, 1968-69) 發動「布拉格之春」民主化運動，試圖建立「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然而，這場改革在同年 8 月遭到蘇聯及華沙公約國軍隊的武力鎮壓而失敗。隔年，大學生揚·帕拉赫 (Jan Palach) 在布拉格自焚，以抗議蘇聯佔領，他的行動成為捷克反抗精神的象徵，並凝聚了民族團結。

1989 年 11 月 17 日，布拉格的學生示威遊行遭到鎮壓，卻意外引發了全國性的大規模抗議。這場沒有經過大規模流血衝突的「絲絨革命」(*Velvet Revolution*)，成功推翻了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哈維爾當選為總統，捷克斯洛伐克重歸民主。革命後，隨著民主化的影響，斯洛伐克的獨立主張日益強烈。1993 年 1 月 1 日，捷克與斯洛伐克以和平方式分離，史稱「絲絨分離」(*Velvet Divorce*)。

參、捷克的認同歷程發展

民族主義一直是學術研究中探討國家認同的重要視角，涵蓋身份認同的多重面向，對理解文化、政治與社會機制的運作具有關鍵意義。國家認同的形成往往依賴於內部群體（我者）與外部群體（他者）的區分，這種界限不僅塑造個人的自我認知，也影響群體凝聚力與民族文化的發展。國家認同是一個多層面的概念，融合了政治、文化與社會等諸多因素。其核心在於

如何界定「我者」與「他者」，這種內外之分通常反映了權力結構與文化價值觀。在這一過程中，民族主義通過歷史、文化與情感共鳴，扮演了定義這些範疇的重要角色。¹

捷克的國家認同是一個複雜的建構，融合了歷史、文化、語言和政治等多種元素。這種認同起源於 19 世紀的民族復興運動，經歷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德語化壓迫、捷克斯洛伐克的建立與分離，以及歐盟整合的挑戰。捷克的國家認同通常強調斯拉夫根源、語言復興和對歷史「黃金時代」的懷念，但也面臨現代挑戰，如民族主義與歐洲主義的衝突，及對國家榮譽感的低落。在歷史、文化與社會變遷的長河中，捷克形成了其獨特的國家認同與集體記憶。這一過程深受多重外部統治、內部民族主義萌芽以及近代民主轉型的影響。捷克民族曾長期遭受外來統治，尤其是近 400 年的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使其在政治上缺乏獨立性。在這種背景下，19 世紀的捷克文化民族主義或民族復興運動蓬勃發展，透過對抗「他者」（主要是奧地利）來建構捷克民族「存在」的論述，並強化其民族榮譽感和自尊。布拉格在此時期成為捷克文化民族主義的主要場域與象徵，其舊城廣場、城堡和溫徹拉斯廣場承載著殉教精神、王權象徵及歷史記憶。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美國總統威爾遜『十四點和平計畫』的催生下，捷克與斯洛伐克民族決定共組國家，成立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這項決定主要基於地緣政治的考量、共同利益，以及兩民族在血統、語言、文化和生活習慣上的高度相近性。然而捷克人面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國家認同與想像，重點是捷克民族主義，此認同高於對整體捷克斯洛伐克的國家認同。表面上捷克斯洛伐克主義（Czechoslovakism）是一種推廣單一「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的理念，受德國和義大利統一啟發，強調捷克與斯洛伐克的互惠。但在實踐中，它往往淪為「捷克中心主義」的工具（McEnchroe, 2023），因為捷克領導人主導了這一敘事，斯洛伐克被要求融入捷克文化，而非平等融合。這理念在 1918 年建國時流行，但到 1990 年代被視為失敗。

捷克中心主義，是在歷史寫作、政治理念和國家敘事中常見的現象。這

¹ 本段理論討論改寫自紀舜傑（2024）。

種偏見以捷克視角為中心，過度強調捷克地區的歷史、文化、經濟和政治貢獻，同時忽略或低估斯洛伐克地區的獨立性和貢獻。這種偏見不僅反映在歷史書籍中，還滲透到國家政策和民族認同中，將國家歷史聚焦在布拉格的政治事件，而忽略斯洛伐克的區域歷史。因為布拉格作為政治和文化中心，強化了捷克主導的視角，這種偏見使歷史敘事變得不平衡，斯洛伐克的貢獻（如在中世紀的自治傳統或 19 世紀的民族復興）被邊緣化，往往導致斯洛伐克的不滿和國家內部的緊張。

這種捷克中心偏見是一種民族中心主義的變體，類似於其他國家的「大民族主義」。它假設捷克地區是國家「核心」，斯洛伐克則被視為附屬或「次要」部分。雖然捷克斯洛伐克的形成過程中，捷克和斯洛伐克被視為「兄弟民族」，但從一開始就存在不對等。捷克地區有更強的工業基礎和知識分子階層，而斯洛伐克則在哈布斯堡帝國下長期受匈牙利統治，發展相對落後。這導致國家結構中捷克主導，斯洛伐克常被視為小弟弟，需接受捷克大哥的指導。因此我們看到在斯洛伐克領導人杜布切克在 1968 的布拉格之春之際，試圖推動聯邦化，以對抗捷克中心主義。

捷克中心的偏見也見諸於歷史書籍中，許多 19-20 世紀的捷克歷史學家，如弗·帕拉茨基（Frantisek Palacky），在其著作中將捷克歷史浪漫化為歐洲民主的先驅，但忽略斯洛伐克的平行發展，這導致斯洛伐克歷史被簡化為「捷克延伸」，而非獨立敘事（Svoboda, 1984）。相比之下，像 Thomson（1953）在其經典的歷史著作《歐洲歷史中的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 in European History*）中試圖平衡視角，強調斯洛伐克的貢獻，以避免這種偏見。聚焦於該國在中歐乃至整個歐洲歷史脈絡中的角色。他認為斯洛伐克歷史對世界其他歷史學家似乎不感興趣，因此值得更多強調。這有助於平衡捷克主導的敘事，但也預見了後來 1993 年捷斯分離的根源。捷克中心偏見是 1993 年「絲絨分離」的關鍵因素。斯洛伐克人擔心長期被支配，經濟和文化差異加劇了分歧。分離後，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共和國各自發展，歷史敘事也較為平衡。

肆、絲絨革命與絲絨分離

1938 年的『慕尼黑協定』(*Munich Agreement, 1938*) 導致捷克遭受納粹德國併吞，這成為捷克國族的一大創傷。斯洛伐克在納粹德國支持下曾短暫獨立，被捷克視為「背叛」共和國的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捷克斯洛伐克進入共產黨統治時期。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自由化運動遭到蘇聯鎮壓，隨後推行的「正常化運動」使共產黨保守派掌權，重回高壓統治。在此期間，捷克知識界和文藝界人士受到政治打壓，形成異議份子。哈維爾等異議份子反對進行刑事起訴，但共黨政權全面滲透社會，讓真相揭露變得困難。

1989 年的「絲絨革命」是一場學生發起並最終導致全民參與的非暴力革命，結束了共產黨統治，開啟了民主化進程。革命後，中東歐國家普遍興起「回歸歐洲」的聲浪，期望透過「歐洲化」擺脫「東歐」的負面標籤，提升政治、經濟、社會及安全水平，並加入歐盟。捷克和斯洛伐克於 1993 年和平分離，史稱「絲絨分離」。其和平結果與同一時期南斯拉夫的暴力分裂形成鮮明對比。儘管當時民調顯示大多數人民不贊成分離，但捷克總理克勞斯(*Vaclav Klaus, 1993-97*) 和斯洛伐克總理梅奇亞(*Vladimir Meciar, 1990-98*) 主導談判，最終促成了分離。他們代表了各自地區不同的願景，斯洛伐克尋求更大的自治權，因為他們感到經濟上被邊緣化且文化上具有獨特性，而捷克則傾向於更集中的聯邦或徹底分離以避免持續的緊張關係。兩位領導人同意分離，沒有舉行全民公投，通過直接談判推動，認為這是解決不可調和分歧的務實方案。

時任總統哈維爾是分離的強烈反對者，他在 1989 年的「絲絨革命」中領導了推翻共產主義政權的運動，並於同年 12 月 29 日當選為捷克斯洛伐克總統。作為總統，他象徵著國家統一和民主轉型，致力於建立一個更平等的聯邦制度，以緩解捷克和斯洛伐克之間的經濟與文化分歧。在分離前夕，他被視為「聯邦主義者」(*federalist*) 的代表，主張通過改革而不是解體來解決問題。例如在 1991 年初，他提議將國名改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Czechoslovak Republic*)，試圖強化國家的統一身份，但這一提議引發

了斯洛伐克方面的不滿，成為分離爭議的起點之一。作為捷克斯洛伐克的象徵性人物和絲絨革命的領袖，哈威爾主張國家統一，認為分離會削弱兩國的國際地位。他甚至以辭職威脅來阻止分離談判，但最終未能改變克勞斯和梅奇亞的決定。哈維爾在 1992 年 7 月辭去總統職務，部分原因是對分離的無力阻止。

檢視當時反對分離的力量較為分散，且沒有形成足夠強大的群眾運動。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間的民族關係相對融洽，缺乏類似南斯拉夫那樣的激烈民族衝突，這使得反對運動未能激起廣泛的社會動員。另外雖然民調顯示許多人不願分離，但公眾對政治進程的參與度較低，且對分離的後果缺乏清晰預期。許多人最終接受了分離，認為這是一種不可避免的妥協。而且當時捷克斯洛伐克與其他後共產主義國家不同，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間幾乎沒有民族暴力或深層仇恨，他們在聯邦體制下相對和諧共存。捷克斯洛伐克的經濟發展不平衡，捷克地區更為工業化，斯洛伐克則更偏農業，導致政策需求不同。分離使兩國能夠追求各自的改革，資產按人口比例大致以 2:1 分配給捷克一方，貨幣和軍隊等實際問題通過立法高效處理。此外，分離發生在共產主義垮臺後不久，中歐的國際環境相對穩定，沒有外部勢力干預。這使內部談判得以順利進行，避免了該地區其他地方的混亂。

「絲絨分離」對中歐產生了深遠影響，是後冷戰時期罕見的和平國家分離範例，其影響在政治、經濟和國際關係領域持續顯現。它展示了聯邦國家可以和平解體，為其他面臨類似民族或經濟分歧的地區提供了藍圖。這與南斯拉夫戰爭的血腥衝突形成鮮明對比，彰顯了談判而非衝突的價值。況且分離催生了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兩個主權國家，使它們能夠走上不同的發展道路。兩國分別於 1999 年和 2004 年加入北約，並於 2004 年加入歐盟，加速了經濟和民主發展。捷克共和國成為更強的經濟體，而斯洛伐克通過改革迎頭趕上，包括在 2009 年採用歐元。

分離後，捷克和斯洛伐克保持了非常密切的關係，擁有開放的邊界、雙重國籍選項和共用的文化交流。分離使雙方能夠確認各自的民族認同而無怨恨，儘管在宗教信仰上（斯洛伐克比捷克更虔誠）差異更加明顯。捷克分離獨立後的憲法序言強調了公民的集體決心，旨在恢復獨立國家，根植於

波希米亞、摩拉維亞和西里西亞的歷史傳統，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國家的國家精神。這體現了自由、尊嚴與責任的國家精神：國家被視為「自由公民的家園」，公民享有平等權利，並意識到對社區的責任。這種精神強調以人權和公民社會原則為基礎，構建一個尊重人類尊嚴與自由的國家，同時承諾保護自然、文化、物質與精神財富。這反映了捷克在後共產主義時代追求的開放與包容精神。²

這段序言反映了捷克從 1989 年「絲絨革命」後脫離共產主義統治、重建獨立國家的歷史轉型精神。它強調「人類尊嚴與自由的神聖性」(sanctity of human dignity and liberty)，將國家定位為「自由公民的家園」(homeland of free citizens)，並融入歐洲與全球民主大家庭。這不僅是對歷史傳統的忠誠（如捷克王冠領土與捷克斯洛伐克國家的遺產），還體現了後共產主義時代的開放與包容精神：公民不僅享有平等權利，還需意識到對社區的責任。這與捷克的歷史經歷相呼應，例如二戰後的獨立掙扎與 1993 年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分離，突顯了和平轉型與集體責任的國家精神。

分離後，捷克選擇深化轉型正義的實踐，並持續開放共產時期的個人檔案、執行整肅法、歸還國有財產等。捷克保持清晰且強烈的國家認同，對歐洲整合抱持「歐洲懷疑論」(Euro-scepticism)的態度(鄭得興、張家銘, 2013)。他們更強調國家利益高於抽象的歐洲認同，認為歐盟應主要維持經濟共同市場功能，而非深化政治整合。即使在民主化和加入歐盟後，捷克仍保持國家認同高於歐洲認同的態度。前總統克勞斯將自己定位為「歐洲實在論者」(Eurorealist)，主張捷克的歐洲認同應以國家利益為基礎，這與其歷史上為維護民族地位而努力的集體記憶相符。民調也顯示，捷克人民對國家的親近性遠高於對歐洲的親近性，且對加入歐盟後的生活改善感受不深。(鄭得興, 2008) 可以說捷克人認為國家認同的「利益」高於歐洲認同，所謂的「利益」是要建立在日常生活的實際層面，回歸歐洲的目的就是為了讓生活更好。歐洲認同是一種建構出來的、以國家利益為前提的理性選擇結果。

而對 1989 年後出生的捷克年輕世代而言，在民主化、全球化和市場化

² 捷克憲法條文與討論請見王源森 (2007)

的社會環境中成長，他們的國家認同明確來自獨立的捷克共和國。他們對歷史的認知主要來自正規教育和社會傳播，其歷史意識不似年長世代那樣複雜，較少舊國族認同的情感糾結。雖然他們認為歷史知識和記憶很重要，但比起斯洛伐克年輕世代，他們對過去歷史的悲情較不傾向「忘掉歷史，向前看」的態度（鄭得興、張家銘，2013）。絲絨革命 35 年後的調查顯示，近半數捷克人認為當前民主體制優於過去的共產體制，其中 30 歲以下的年輕世代幾乎一致偏好民主。年輕人主要是經由父母或祖父母的經歷認識共產時代，他們沒有直接的生活體驗，更欣賞民主的自由與機會。對 45 至 60 歲的人而言，也會出現對共產政權的懷舊情感，因舊政權帶來確定性和穩定感，而現在面臨不安（張芷瑄，2024）。

伍、國家認同相關民意調查

探究一個國家的國家認同的需要從多重面向得知，例如普遍性國家光榮感，調查通常會用一個直接問題來測量，例如「身為 X 國公民，您有多感到光榮？」。也會深入詢問受訪者對國家在特定領域的成就感到多麼光榮，例如：體育成就、歷史、藝文成就、科技成就、民主運作方式、經濟成就、軍隊、社會福利系統等。此外，也可以透過一系列標準來了解民眾如何定義「真正的國民」。文化民族的標準，也可說是比較具有原生要素，包含在該國出生、使用該國語言、擁有該國血統、信奉特定宗教等。另一方面，政治民族（或稱國家民族）的標準，比較類似建構論或是制度論的標準，則包含擁有該國國籍、尊重該國的政治制度與法律（Vlachova, 2019）。

在捷克的調查上，根據 2017 年歐洲價值觀研究的數據，捷克人的普遍性國家光榮感在歐盟國家中相對較低。1995 年和 2003 年的 ISSP 數據也顯示，前捷克斯洛伐克兩國（捷克與斯洛伐克）的國家光榮感在國際排名中偏後（Vlachova, 2019）。在特定領域的國家光榮感上，捷克人對國家的光榮感來源存在明顯差異。他們普遍對文化與體育成就（如運動、歷史、藝文、科技）感到驕傲，但對國家治理表現（如民主運作、經濟成就、世界政治影響力）的光榮感則低得多。值得注意的是，從 1995 年到 2003 年，捷克人對

體育成就和軍隊的光榮感顯著提升 (Vlachova & Rehakova, 2009)。捷克的民意調查顯示，政治興趣、對政府的信心、對民主發展的滿意度、個人幸福感和社會信任度都顯著影響普遍性國家光榮感。此外，年長者和中等教育程度者也傾向有更高的國家光榮感。導致低光榮感的原因主要在於國內社會問題，例如對政治狀況、腐敗、詐欺、道德水平、和人際關係的負面觀感 (Vlachova, 2019)。

在定義「真正的捷克人」是理解其國家認同的核心。這個定義在「文化民族」(ethno-nation) 與「政治民族」(state-nation) 兩種模型之間擺盪。根據調查，會說捷克語、自我認同為捷克人、以及擁有捷克國籍，是長期以來被視為成為「真正捷克人」最重要的幾個標準。歷史學家 Holy (2001) 也指出，捷克人認為身份是自然衍生的，主要標準包括：在捷克土地上出生、母語是捷克語、有捷克父母，以及主觀上「感覺自己是捷克人」(Vlachova & Rehakova, 2009)。1995 年的調查顯示，捷克的國家形象較偏向「政治民族」，除了語言和自我認同外，「尊重捷克的政治制度與法律」也是一項重要標準 (Holy, 2001)。然而到了 2003 年，此項標準的重要性顯著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一生中多數時間居住在捷克」。這反映出捷克的國家形象基礎，從較為現代、開放的政治標準，轉向更強調血緣與文化根源的傳統基礎。

捷克的國家認同具有強烈的世俗性，這與歷史上反抗天主教會與外來統治的經驗有關。此外，認同也與捷克的領土緊密相連，只有居住在這片土地上並講捷克語的人，才被普遍視為真正的捷克人。有趣的是，國家認同並非最重要的集體認同：2003 年 ISSP 調查顯示，對捷克人而言，職業認同和家庭認同的重要性高於國家認同，國家認同僅排名第五。這挑戰了國家認同是基礎性或主導性認同的觀點 (Vlachova, 2019)。

陸、族群議題

捷克的族群衝突主要表現為社會緊張和偶發暴力事件，而非系統性武裝衝突。這反映了中歐國家在後共產主義轉型期的典型挑戰，都是歷史遺留的民族主義與當代移民壓力交織。捷克共和國作為一個高度同質化的中

歐國家，其族群結構以捷克人為主(約 64%)，但少數族群如羅姆人(Roma，約 2-3%)、烏克蘭人(約 1-3%)、斯洛伐克人(約 1.4%)和越南人(約 0.5-1%，是歐洲最大的越南裔社群)等也存在。捷克的族群關係整體穩定，沒有大規模武裝衝突或內戰，但歷史遺留的緊張(如二戰後德裔人驅逐)和當前社會問題(如反羅姆情緒)導致零星衝突和持續歧視。

捷克的族群緊張可追溯至奧匈帝國時期，德國人和捷克人之間的衝突在 20 世紀達到高峰。在二戰後，約 290 萬蘇台德德裔(Sudeten Germans)被驅逐，這是歐洲最大的族群遷移之一，導致持久的歷史創傷。蘇台德德裔衝突是捷克認同的歷史傷痛，源於 1938 年慕尼黑協定與二戰後驅逐德裔人口的『貝內什法令』(*Benes Decrees, 1938*)。此驅逐被視為民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影響捷克的歐洲整合。蘇台德德裔問題的核心爭議議題主要圍繞在以下 3 大議題，分別是責任歸屬、重返故鄉、與財產歸還與金錢賠償。責任歸屬議題探討二戰期間的歷史責任應由誰承擔。希特勒的種族侵略行為與戰後捷克對蘇台德德裔人的驅逐，此爭議結束了兩民族長久以來的和平相處局面。延伸的重返故鄉問題，爭議的是戰後被驅逐的蘇台德德裔人是否擁有返回其原居地的權利。最後則是被驅逐的蘇台德德裔人，其在故鄉被沒收的財產是否應予以歸還，及是否應提供金錢賠償(陳泰仁 1999)。

在後冷戰時期，為了避免蘇台德德裔問題阻礙雙邊關係並影響各自的國家利益，德國與捷克開始進行協商與和解工作。1997 年簽署的『德捷和解宣言』(*German-Czech Declaration, 1997*)是解決這些爭議的重大進展，兩國政府在此宣言中大部分解決了相關問題，並共同建立了和解機制，為兩民族間真正的和解創造了良好基礎(Glassheim, 2000)。2025 年，蘇台德德國人大會讚揚與捷克的和解，強調關係改善；捷克政府釋放資金維護德裔墳墓，象徵歷史和解(*Brno Daily, 2025*)。然而，衝突未完全消弭：強迫遷移的長期影響邊境地區的社會結構，留下少數德裔(約 45 萬人後裔)面臨認同困境，部分被強制捷克化。這種衝突塑造捷克的「民族神話」(national mythologies)，將德裔視為「他者」，但歐盟壓力則促使反思(Glassheim, 2000)。

另一個族群議題是關於羅姆人，此族群(估計約 25 萬人，佔 2-3%)是

捷克最大的少數族群，但面臨系統性歧視，導致其與主流捷克認同的嚴重斷層。許多捷克人對羅姆人持有負面觀感，媒體常將其標籤為「反社會」或「犯罪者」。教育分離（50%羅姆兒童被送往特殊學校）、住房歧視（常被拒租）、以及高失業率（約 70%），使羅姆人難以融入（Amnesty International, 2015）。共產時期的強制絕育（影響數千羅姆婦女，至今未完全賠償）加劇了歷史創傷。歐洲人權法院年判決）及歐盟多次批評捷克的羅姆政策執行不力，顯示結構性種族主義。2021 年羅姆男子死亡事件引發抗議，凸顯認同衝突可能引發社會不穩。顯示羅姆人的排斥不僅削弱捷克的民主認同，還挑戰其作為歐盟成員的多元價值承諾（Cada, et al., 2015）。

此外，捷克共和國作為中歐國家，其公眾對非歐盟移民（特別是來自中東、非洲或亞洲的移民）的態度整體偏向負面或謹慎，視移民為潛在的社會、經濟與安全問題。這反映了歷史上的反移民傳統、2015 年歐洲難民危機的影響，以及近年經濟壓力與地緣政治（如俄烏戰爭）的複雜性。然而，近年民調顯示態度有緩和趨勢，尤其對勞工移民與烏克蘭難民的支持度上升，部分歸因於勞動力短缺與歐盟整合壓力。2020/22 歐洲社會調查（ESS）顯示，53%的捷克人認為移民讓國家變得更糟；56%視外國人為健康風險，52%連結犯罪上升，41%關聯失業增加。但從 2003 年的 73%降至 2022 年的 50%，顯示負面態度逐漸減弱（Kumar & Velichkova, 2025）。另一項最新的調查顯示，50%的捷克人認為「新到來的其他國籍公民」對國家整體構成問題，41%認為不構成問題；僅 21%認為在居住地構成問題。負面觀點在女性與 55 歲以上長者中更普遍，年輕群體（20-29 歲）較正面（Kyselá, 2025）。以上這些新移民的增加，對捷克傳統上以單一民族（捷克人）為認同核心，不同程度上都帶來文化多元化挑戰，也是捷克國家認同的重要課題。

柒、結論

總結來說，捷克的國家認同和集體記憶是在數百年外來統治中萌芽，在 19 世紀文化民族主義中壯大，強調語言、文化與領土的連結。在 20 世紀兩次建國與分離、以及共產統治和非暴力民主革命的過程中持續形塑。1918

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成立後，認同融入國家框架，試圖融合捷克與斯洛伐克民族，卻因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斯洛伐克獨立及 1968 年聯邦化而弱化。1993 年的分離標誌著捷克認同的轉折點，並促使認同從憲政基礎轉向更強的民族文化基礎。

捷克認同的特性展現在堅固的國家認同、對歐洲整合的實用主義態度（歐洲懷疑論）、以及透過藝術、歷史教育和社會對話來傳承和重構歷史記憶，確保其民族精神與國家利益的核心地位。特別是視語言、宗教、祖先以及在該土地上的出生密切相關。捷克國家認同不僅包含對捷克土地的認同，也包含與奧匈帝國、捷克斯洛伐克歷史的聯結。國家是民族認同的最高認同實體，人們會同時對地方（村莊、城鎮）、地區、國家甚至歐洲聯盟形成多重認同。捷克國家認同與政治認同互相編織，捷克民族主義中還存有捷克斯洛伐克主義的遺緒，表現出民族認同並非單一面向，而是多元且流動的認同。

參考文獻

- 王源森，2007。〈捷克共和國憲法〉《國會季刊》35卷7期，頁101-22。
- 紀舜傑，2024。〈波蘭的國家認同——歷史與文化交織的民族自豪〉《台灣國際研究季刊》20卷3期，頁127-45。
- 姚惠茹，2022。〈幸福企業！鴻海獲捷克頒發「最佳十年雇主獎」第二名〉《財經新報》6月20日（<https://finance.technews.tw/2022/06/20/nicky-monaghan/>）（2025/10/19）
- 陳泰仁 1999 《以「蘇台德問題」探討後冷戰時期德國與捷克的關係》碩士論文。大林：南華管理學院歐洲研究所。
- 楊思敏、梁駿樂，2024。〈原本親中！捷克轉“友台” 台捷關係近年大躍進〉《民視新聞網》5月5日（<https://tw.news.yahoo.com/原本親中-捷克轉-友台-台捷關係近年大躍進-130227701.html>）（2025/9/20）
- 張芷瑄，2024。〈絲絨革命 35 年 2 / 絲絨革命 35 年 研究：近半數捷克人認為民主比共產好〉中央通訊社，11月16日（<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411160215.aspx>）（2025/8/30）
- 鄭得興，2008。〈捷克的國家認同與歐洲認同——民意與政黨之認知差距〉《台灣國際研究季刊》4卷4期，頁211-44。
- 鄭得興、張家銘，2013。〈國家認同差異性下之集體記憶框架——捷克及斯洛伐克分裂後的年輕世代〉《台灣國際研究季刊》9卷4期，頁115-41。
-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15. “Must Try Harder: Ethnic Discrimination of Romani Children in Czech Schools.” (<https://www.right-to-education.org/resource/must-try-harder-ethnic-discrimination-romani-children-czech-schools>) (2025/9/15)
- Brno Daily. 2025. “Sudeten German Congress Praises Reconciliation with Czechs.” Jube 9 (<https://brnodaily.com/2025/06/09/news/sudeten-german-congress-praises-reconciliation-with-czechs/>) (2025/9/15)
- Čada, Karel, Daniela Büchlerová, Zuzana Korecká, Tomáš Samec, Martin Ouředníček, Zuzana Kopecká, Jaroslava Barbora Sporková, and Jarmila Tinlová. 2015. “Analysis of Socially Excluded Localities in the Czech Republic.” Prague Ministry of Labour and Social Affairs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84181750_Analysis_of_Socially_Excluded_Localities_in_the_Czech_Republic) (2025/9/24)
- Glassheim, Eagle. 2000. “National Mythologies and Ethnic Cleansing: The Expulsion

- of Czechoslovak Germans in 1945.”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ol. 33, No. 4, pp. 463-86.
- Holy, Ladislav. 2001. *The Little Czech and the Great Czech Nation: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Post-Communist Social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umar, Claire., and Katerina Velichkova. 2025. “With Elections Looming, How Does the Czech Public Feel about Immigration?” ODI Global, September 19 (<https://odi.org/en/insights/with-elections-looming-how-does-the-czech-public-feel-about-immigration/>) (2025/9/12)
- Kyselá, Monika. 2025. “Opinions of the Czech Public on the Presence of Foreigners in the Czech Republic.” CVVM, July 31 (<https://cvvm.soc.cas.cz/en/press-releases/other/relations-attitudes/6149-opinions-of-the-czech-public-on-the-presence-of-foreigners-in-the-czech-republic-may-2025>) (2025/8/16)
- McEnchroe, Thomas. 2023. “The Rise and Fall of Czechoslovakism.” *Radio Prague International*, January 4 (<https://english.radio.cz/rise-and-fall-czechoslovakism-8771296>) (2025/10/19)
- McVicar, Daniel. 2023. “How the Czech Republic Became One of Taiwan’s Closest European Partners and What It Means for EU-China Relations.”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April 24 (<https://www.cfr.org/blog/how-czech-republic-became-one-taiwans-closest-european-partners-and-what-it-means-eu-china>) (2025/9/12)
- Pohanka, Vit. 2022. “Golden Czech Hands: Cliché or Reality?” *Radio Prague International*, November 17 (<https://english.radio.cz/golden-czech-hands-cliche-or-reality-8767121>) (2025/9/12)
- Svoboda, George J. 1984. “The Political Struggles in Bohemia and František Palacký (1860–70).”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 12, No.1, pp. 33-37.
- Thomson, S. Harrison. 1953. *Czechoslovakia In European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Vlachova, Klara. 2019. “This Country Is Not for Anyone: Explanations of Low National Pride in the Czech Republic.”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 47, No. 6, pp.1000-1012.
- Vlachova, Klara, and Blanka Rehakova. 2009. “Identity of Non-self-evident Nation: Czech National Identity after the Break-up of Czechoslovakia and before Cession to the European Union.”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15, No.2, pp 254-79.

Wikipedia. 2025. “Truth Prevail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ruth_prevails)
(2025/12/26)

National Identity of Czech

Shun-jie J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Futures Design, Tamkang University, Tamsui, New Taipei, TAIW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zech Republic to explore the key elements of its nationalism and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national identity. It uses the context provided by identity theory to discuss the significant forces and issues surrounding Czech national identity, which began to emerge under centuries of foreign rule and grew stronger during the 19th-century cultural nationalism, emphasiz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language, culture, and territory. Throughout the 20th century, during two instances of state formation and separation, as well as under communist rule and through non-violent democratic revolutions, it continued to evolve.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zechoslovak Republic in 1918, identity was integrated into the national framework, attempting to merge Czech and Slovak nationalities, but was weakened by Slovak independence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federalization in 1968. The separation in 1993 marked a turning point for Czech identity, prompting a shift from a constitutional basis to a stronger ethnic and cultural founda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zech identity are reflected in a solid national identity, a pragmatic attitude towards European integration (Eurocepticism), and the transmiss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memory through art, historical education, and social dialogue, ensuring the core position of its national spirit and interests. Language, religion, ancestry, and birth on this land are particularly closely related. Czech national identity is interwoven with political identity, and remnants of Czechoslovakism still exist within Czech nationalism, demonstrating that national identity is not a single dimension but a diverse and fluid identity.

Keywords: Czech centrism, Prague Spring, Velvet Revolution, Velvet Divorce